

吳敬璣  
萬以寧

江平

茅子軾

資中筠

高尚全

余英時

李澤厚

許倬雲

袁偉時

轉折點

中國在歷史的

當代十賢訪談錄

採訪◎馬國川

CRITICAL  
JUNCTURE

# 中國在歷史的轉折點

——當代十賢訪談錄



CRITICAL JUNCTURE

採訪◎馬國川

轉折點上  
中國 在歷史的  
當代十賢訪談錄

江 慶寧  
茅于軾 平  
資中筠  
高尚全  
余英時  
李澤厚  
許倬雲  
高雲  
袁偉時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http://www.hkopenpage.com)

責任編輯

丁志紅

裝幀設計

彭若東

責任校對

江蓉甬

排 版

潘斯麗

印 務

馮政光

書 名 訪 訪

馬國川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九號北角工業大廈十八樓

<http://www.hkopenpage.com>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字樓

陽光印刷製本廠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新藝工業大廈六字樓

二〇一二年九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三十一開 (148mm × 210mm) 一八八面

ISBN 978-988-8200-11-5

© 2012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 序 言

對中國大陸來說，二〇〇八年是轉折性的一年。這年夏天成功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被某些人視為中國崛起的標誌。恰好在這一年年末，世界金融危機爆發，許多發達國家陷身其中，而中國依靠強力的刺激政策保證了經濟繼續高速增長，在危機中一枝獨秀，「中國模式論」遂大行其道。在一些宣揚者看來，「中國模式」不僅成就了中國奇跡，也應該向全世界推廣。在主流媒體高調宣傳中，似乎全世界都在走向深淵，只有中國從成功走向更大的輝煌。於是，突然之間，盛世降臨了，讚頌之聲遍於海內。

更令人愕然的是，許多知識分子也開始轉向。那些一度指責中國改革被新自由主義誤導的「新左派」們，迅速撥轉方向盤，起勁地鼓吹「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持有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群體也發生了分裂，一些人懷疑自己曾經相信的價值觀，一些人公開支持和讚揚「中國模式」，更有個別人走向國家主義。改革遭遇了空前的困境。如果說，在二〇〇八年之前的數年間，批評、否定改革的「改革失敗論」一度甚囂塵上，那麼從二〇〇八年開始，以「中國模式論」為代表的「改革成功論」浮出水面，而且聲音越來越響亮。既然改革已然成功，中國模式舉世應學，何必再改革呢？因此，改革停滯不前，在某些領域甚至出現了倒退。

四年來，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降身辱志，加入「頌聖」的合唱團而恬然自得。其中當

然不乏心智蒙蔽之人，更多的則是精明的利己主義者——他們明知道冰山終究要消融，但是自己要趕在此前「分一杯羹」。這種群體性的底線下沉，在歷史上恐怕也是少見的。在薩義德看來：「最該指責的就是知識分子的逃避；所謂逃避就是轉離明知是正確的、困難的、有原則的立場，而決定不予以採取。」如果說以前在強權的高壓下，一些知識分子喪志變節尚屬情有可原的話，那麼在利益面前罔顧名節，主動彎曲脊樑，誠屬自取其辱，夫復何言！

就在這樣的時代裡，卻有一批耄耋之年的知識分子站出來，秉筆直書，直言儻論。他們不粉飾，不搪塞，不推諉，不避諱，直指中國面臨的巨大問題：資源日益短缺，環境破壞嚴重，腐敗四處蔓延，貧富差別懸殊，道德水平滑坡，社會矛盾激化……他們提醒國人，中國不是盛世，而是矛盾重重，「兩種可能的前途嚴峻地擺在前面：一條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著強化政府作用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吳敬璉語）中國經濟能不能平穩增長，社會能不能和平轉型，都是重大的現實問題。他們呼喚改革，直言「不改革，無出路」。

這種「老年人燃燒，年輕人取暖」的現象值得深思。中國是一個推崇實用理性的國家，沒有宗教傳統，基於良知的道德堅持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為甚麼這些老人會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絕大勇氣？因為近代以來幾代知識分子對民主、自由、富裕、文明的現代中國的追求傳承到他們的肩上，他們不為一己謀私，而是為國家前途、民生福祉著想，所以他們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順逆，

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王陽明語），絕沒有中國文人常有的酸氣、矯情，更沒有奴才氣，成為「一塌糊塗的泥塘裡的光彩和鋒芒」（魯迅語）。

作為一名記者，我非常幸運地採訪過許多「燃燒的老年人」。本書中筆者所採訪的十位老人，都見證了中華民族近百年的苦難。其中有七位生於一九三〇年，兩位生於一九二九年，一位生於一九三一年，他們每個人也都歷經磨難，但是不改初衷，老當益壯。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對知識分子有兩個精闢的定義：一是「敢於對權勢說真話的人」，一是從專業的圍牆裡漂流出來關懷社會、關心民瘼的「業餘人」。余英時先生也曾指出：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之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於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這些「燃燒的老年人」都是各自專業裡的聲望卓著的大家，不過他們沒有身衣學術的華光靜坐在書齋裡安享榮耀，而是堅持獨立思想，不屈從任何政治壓力，敢於獨立思考；堅持批評精神，以自己的學術良心，敢於批判現實。他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孔子說：「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捨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為匹夫而願富貴，為諸侯而無財。」按此定義，本書中十位受訪者都是當之無愧的「賢人」。因此，將他們稱為「當代十賢」，不亦宜乎？

中國，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十字路口。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總量實現了爆發式增長。二〇一〇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出口超過德國，躍居全球

第一位。如果能夠按照目前的速度發展，中國經濟總量不是沒有超過美國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已經積累到一個臨界點，再加上國際形勢的變化，使得某些激進主張開始萌動，如果不盡快重啟改革議程，紓緩社會矛盾，就可能發生「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顧准語），危及甚至中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歷史有情更無情。歷史長河的一個小小「三峽」，就可能是一個國家百十年的窮途彎路、幾代人的悲慘際遇。

在這樣的歷史關鍵時刻，「當代十賢」都表達了對於中國現實的憂思，並提出了解決之道。他們的思想可以幫助讀者增進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對中國現實的認識，更理性、更深入地思考中國的現實問題，探求中國平穩實現現代轉型的道路。他們的獨立思想、批評精神，更值得後來者學習和敬仰。「不信東風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假如中國的知識界都能夠像「當代十賢」這樣，做到「不降身，不辱志，不追趕時髦，也不迴避危險」（胡適語），就會形成強大的社會影響，那麼中國也許會避免最壞的選擇，走上一條和平的轉型之路。

感謝所有接受採訪的老人們，他們不僅給予我思想的啟迪，也讓我感受了真正的知識分子的人格光輝。

感謝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總經理陳翠玲，如果沒有她的鼎力支持，就沒有這本書的出版。

馬國川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日於北京

# 目錄

江平		
中國法治三十年	86	72
我只坐在法律一邊		
厲以寧		
我與股份制	58	40
世界經濟危機的啟示		
吳敬璉		
重啟改革議程		14

茅于軾

自由的擴大與中國改革三十年

資中筠

重建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擔當

附錄：資中筠的思想歷程

高尚全

各種體制改革都要推進

余英時

回首辛亥革命，重建價值觀念

李澤厚

如果不改革，中國會慢慢爛下去

附錄：中國需要甚麼樣的現代性？（李澤厚、秦曉）

215 204

178

158

140 128

100

許倬雲

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過程

袁偉時

盲目歌頌「中國模式」是很危險的

「我們都是在還歷史舊賬」

代後記：影響中國未來的八個趨勢

282

268 256

228



# 吳敬璣

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一九三〇年一月生於南京，江蘇武進人。一九五四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一九五四—一九八四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任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辦公室副主任，一九八四年至今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曾擔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現為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二〇〇五年榮獲首屆「中國經濟學獎傑出貢獻獎」。主要著作有《論競爭性市場體制》（合著）、《現代公司與企業改革》、《何處尋求大智慧》、《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中國增長模式的抉擇》等。

# 重啟改革議程

採訪嘉賓：吳敬璉

採訪時間：二〇一二年六月

筆談

## 上篇：「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

馬：在過去三十年中，中國「兩頭冒尖」的圖景輪廓顯得更加突出和鮮明了。從光明面看，三十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二〇一〇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DP）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二位；中國出口超過德國，躍居全球第一位。與此同時，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億人口脫離極貧地位。另一方面，中國經濟迅速發展所付出的代價也極其高昂，而且對於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的大國來說，GDP總量增長並不足以說明問題。特別嚴重的是，近年來資源短缺，環境破壞愈演愈烈；腐敗蔓延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貧富差距懸殊，威脅到社會穩定。

在這種「兩頭冒尖」的現象愈演愈烈的情況下，從世紀初開始，「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變得愈來愈尖銳，形成了幾種互相對立的主張。

吳：我在二十世紀末期多次說過，在這種半統制經濟、半市場經濟的雙重體制下，中國社會一直存在一個「向何處去」的問題。兩種可能的前途嚴峻地擺在前面：一條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著強化政府作用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這樣，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成

為一場兩種趨勢誰跑得更快的競賽。

在此基礎上，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之交，大體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取向：

第一種觀點主張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逐步消除舊體制的遺產，建立基於規則的市場經濟體制，或者稱「法治的市場經濟」。

第二種觀點把「半統制、半市場」的體制看作一種可能的體制目標。二〇〇八年以來被炒得很熱的「中國模式」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它宣稱，中國經濟能夠在近二三十年中創造世界公認的優異成績，根本原因正在於中國擁有一個強勢的政府和具有強大控制力的國有經濟。這種體制能夠正確制定和成功執行國家戰略，不但中國應該繼續堅持現有體制，世界各國也應該學習借鑒。而一些代表尋租活動特殊既得利益的人們，不但積極維護現有體制，還力求進一步增強各級政府不受約束的權力，以便擴大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

在前面兩種社會力量展開對戰、而社會實際生活中權貴資本主義的影響日益顯化的情況下，第三種社會力量公開亮出了他們回到改革開放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主張。他們極力要讓人們相信，目前中國遇到的種種問題，不管是腐敗猖獗、分配不公，還是看病貴、上學難，甚至國有資產流失、礦難頻發，都是市場化改革造成的。他們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擴張政府的權力，加強行政機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工商業實行「國進民退」，實現再國有化；農業重新「歸大堆」，實現再集體化。甚至要求重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幟，